

核心阅读

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孕育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是什么，而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又牵涉到另外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了这一思想。综合而言，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了这一时代背景的主基调。

全球性相互依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

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高度相互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性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的相互依赖性。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融入到全球大的发展体系之中，奉行开放发展、包容增长的理念与政策，同时将本国的发展战略与他国的发展战略很好地对接，这样才能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发展机遇与愿景相互关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因而，这种发展必然是一种互动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多赢的发展、共同的发展。

二是风险与挑战的相互依存性。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恶化、恐怖

主义、粮食安全、核危机、难民潮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世界各国与地区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可以说，风险与挑战的跨国性、联动性特点决定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风险与挑战面前不允许有“旁观者”“退缩者”，更不能有“转嫁责任者”“损公肥私者”。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共同面对挑战，合力应对危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三是议题的相互交融性。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科技等不同议题领域的边界已经远不如之前那样清晰可见，并且这些议题的相互交融性与交换性明显增强，从而极易引发“共振效应”。客观来说，这种议题领域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国家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要求各国必须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视角与方法来加以应对与处理。总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基于二战后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机制、规范、原则与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权力配置的变化以及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现有国际机制暴露出重大缺陷。联合国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报告中坦承，“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暴露了金融市场运作的体制性失效以及

经济决策核心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紧随其他几场危机爆发的”，粮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接踵而至，暴露了我们的全球治理机制在这些挑战面前，存在的严重弱点”。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有两大表现。

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反映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日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仅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例。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器与主力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8年、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皆为3.9%，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与2.2%，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为4.9%与5.1%。然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架构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与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率明显不相匹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例。美国占有16.52%的投票权，在重大事项决议中拥有一票否决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投票权分别为6.15%、5.32%、4.03%、4.03%。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的投票权也仅为6.09%。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与代表性很不够”的问题，这一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们却漠然置之，并以各种方式阻挠、迟滞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进行必要的、与时俱进的改革与调整，从而使得这一治理体系的滞后性、失衡性更为凸显。

上述状况又导致了第二个重要挑

战的衍生与固化，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治理失灵的现象屡屡发生。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矛盾性、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凸显，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导性力量，同时对国际体系的变化也十分敏感。大国重视国际体系的塑造，并将其作为占据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制高点的有效途径。从历史上看，国际体系剧烈变动时期，主要因国际力量格局的再调整、再平衡所起，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动荡。二是全球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现象出现。国家间共同利益逐渐让位于竞争性利益，甚至排他性利益，国际关系“以邻为壑”的现象有可能重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仍未消除，全球贸易和投资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波动，世界经济处于艰难复苏之中。三是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地区热点问题难以破解，安全困境日渐深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扩张，以及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复合影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与叠加，这些都增加了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的危险。四是国际秩序存在失范的风险。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甚至推卸、逃避国际责任，全球安全、繁荣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出现严重危机的风险。面对如此之多的问题，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无法从根本上作出解答，找到出路，甚至还使经济不平等、发展失衡、气候变化等问题进一步扩大化。有鉴于此，国际社会迫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秩序，开辟人类更

□ 陈积敏

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阐释了为什么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那么即将要阐述的这一点则说明了为什么是中国首先提出这一思想。概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离不开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也反复强调这一点。1983年12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表示：“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古代我们做得不错，对人类有突出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理念才使得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聚焦到世界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所赋予的文明的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新探索，也是对人类社会总体发展规律的宏观认识与整体把握。因而，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科

学的方法指导，这样宏大的思想体系根本无法构建起来。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华文明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立身处世之道，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这些理念与基于人性本恶、物竞天择的西方政治哲学有着明显不同。这种文明的滋养早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就了中国国家行为与国际行为的自觉性。从理论准备与方法指导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一种继承，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使用“共同体”的表述，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如“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阐释共同体，主张“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着眼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更自觉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与考察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突破与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禁锢与制约。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汲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又继承并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这也最终回答了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21世纪的中国才能提出这一宏大战略思想背后的深刻文化因素与理论积淀。

战略视角

美国对华政策真的失败了吗

□ 尤 苗

2018年4月美国顶级学术期刊《外交事务》发表了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ell）和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拉特纳（Ely Rame）的联名文章《中国清算》，直截了当地提出尼克松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了。文章从经济、政治、安全、国际秩序四个方面，指出美国想要改变、重塑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实际的发展现实差距越来越大。基于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两位作者建议美国应重新反思和评估对华战略，并建议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到自己和盟友的建设上。在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日益紧张背景下，该文一经发表，便引发中美两国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回应，王缉思、芮效俭、约瑟夫·奈等知名中美政治学家随后联名撰写《美国错看中国了吗?》，于6月14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的网站上。本文对双方争论焦点进行梳理，希望能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美国错看中国了吗

《中国清算》一文刊出之后，引起中美两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从中国的视角对该文进行了回应。他认为，美国人经常认为自己可以将其他国家变成他喜欢的样子，而当事情向相反方向发展时，美国人就会感到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失望，同样的，中国学者也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感到不满和困惑。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权力斗争、丑闻不断、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心不足、大量推文逐渐导致国家公告、外交事务高级官员频繁更换、重要政府岗位出现空缺，这些现象虽然以前在美国也会发生，但是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更多、范围更广。这些现象使得很多中国学者感到美国开始变得不可

认知和难以预测了。此外，特朗普政府在全球秩序中的态度也让中国政治分析家感到困惑。美国以前经常要求中国遵守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但是现在美国自己却退出或暂停了已有的国际机制，比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化让中国的外交决策者非常困惑，搞不清哪些秩序是美国希望自己和别人都遵守的，哪些国际秩序是美国人希望继续维护的，也看不清楚现在的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所持的立场。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也撰文表示，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是让整个中国变成美国想象的样子。有这种错误认识的人通常无法区分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基于美国价值观，还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事实上，美国制定对华政策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尼克松总统就是说过，对华政策改变的宗旨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美国在冷战中的优势，让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获得地缘优势。当然，基于国家利益的美国对华政策中，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1993年克林顿总统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绑定，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来胁迫中国改变，结果是两败俱伤，最终美国还是放弃了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中美两国具有建设性的合作都对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芮效俭在文中还发出强有力地质问，美国政府难道真的应该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阻碍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如何才能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对华政策的每一步之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应知道中国必将是个更加繁荣的新兴力量，而这不应该是质疑对华政策的原因。难道美国人不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和大国打交道的能力吗？因此，芮效俭建议美国应该继续和中国合作，还要停止向世界传递出美国不再准备担当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的信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去寻求共同

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让美国的发展模式更具有吸引力，可能才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好起点。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南亚与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帕特丽·夏基姆（Patricia Kim）的文章认为，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反映了当前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疑虑，并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但显然坎贝尔和拉特纳将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许多成就都排除在外，这是不妥的。《中国清算》中认为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改变其原有的政治体系，摒弃其发展模式，这种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克里斯坦森和夏基姆认为，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和追求共同的利益来影响中国。当前中美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国际秩序维护等方面仍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此外，《中国清算》认为国际秩序只能有美国来主导，中国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对此，克里斯坦森和夏基姆批评道，这种看法的逻辑不对，按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逻辑，只要中国不断发展强大，影响力日益增加，就会被认为是对华政策的失败。事实上，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他们也不赞同坎贝尔和拉特纳所倡导的改变中国的方式，认为美国不可能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美国人更应该做的事情是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美国的对华政策真的失败了吗？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Nye）教授给予坎贝尔和拉特纳的答复是，现在就对美国对华政策给出全面失败的结论还为时尚早。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优势不仅在军事力量方面，在经济，技术，货币和能源方面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因此当前没有必要夸大对中美关系的恐惧。而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

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不稳定等问题都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并且没有人能确定中国的未来，所以建议美国可以再等等看，不着急下结论。

政治分析家埃里克·李（Eric Li）也不赞同坎贝尔和拉特纳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结论，认为中国融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崛起”，并且中国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贡献者。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已经充分参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机构，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美国不应指望中国要去遵守违背中国国家利益的相关国际秩序。埃里克认为，为了更好地合作，未来中美两国关系的调整是必要的；但这种调整和合作都必须基于对中美两国历史和现实的正确理解，美国精英应该放弃认为只有自己的国家可以获取全球霸权的想法。如果美国能回到重塑自身社会的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那么美国就可能长期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时间会告诉答案

约瑟夫·奈用“时间会告诉答案”来解释现在对中美关系下结论为时尚早。王缉思教授也指出，诚然中美战略竞争和贸易摩擦使得两个国家关系紧张，但是中美两国还是有合作潜力的，比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会帮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而中国人民也有意愿将储蓄花费在美国的医疗技术上。也许约瑟夫·奈教授20年前对美国国会的建议，今天依旧值得借鉴，“美国如果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很可能成为敌人；美国如果将中国纳入国际秩序，虽然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友谊，但中美会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相信中美关系在一次次的反思和调整中会越来越好。

热点透析

（上接1版）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重点领域国家安全是主阵地、主战场，要把确保政治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维护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外部安全。

在军事保障上，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打造坚强高效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在国际环境上，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文明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始终不渝倡导合作共赢理念；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第八，关键所在和决定性力量——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打铁必须自身硬。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同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起来，把党的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执笔：甄占民 牛先锋 陈曙光 李海青）